

● 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图书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

王致谱 主编

伤寒质难

祝味菊述 陈苏生记 农汉才点校 任继学审订



● 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图书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

王致谱 主编

伤寒质难

祝味菊述 陈苏生记 农汉才点校 任继学审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伤寒质难/祝味菊口述; 陈苏生整理; 农汉才点校.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3 (2007. 4 重印)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王致谱主编)

ISBN 978-7-5335-2495-1

I. 伤… II. ①祝…②陈…③农… III. 伤寒论

—研究 IV. R222.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2270 号

- | | |
|-------|------------------------------------|
| 书 名 | 伤寒质难 |
| 丛 书 名 |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 |
| 主 编 | 王致谱 |
| 口 述 | 祝味菊 |
| 整 理 | 陈苏生 |
| 点 校 | 农汉才 |
| 审 订 | 任继学 |
| 出版发行 |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
| 网 址 | www. fjstp. com |
| 经 销 | 各地新华书店 |
| 排 版 |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排版室 |
| 印 刷 |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
| 印 张 | 8 |
| 插 页 | 2 |
| 字 数 | 172 千字 |
| 印 次 | 2007 年 4 月第 1 版第 3 次印刷 |
| 印 数 | 6 501—7 500 |
| 书 号 | ISBN 978-7-5335-2495-1 |
| 定 价 | 18.00 元 |

书中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 王永炎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
- 任继学 长春中医学院教授
国家首批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
- 陈可冀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 陈竹友 福建中医学院教授
- 余瀛鳌 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 俞慎初 福建中医学院教授
国家首批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
- 盛国荣 福建中医学院教授
国家首批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
- 程莘农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中医研究院教授
- 裘沛然 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
国家首批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
- 路志正 中国中医研究院教授
国家首批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编委会

主 编:王致谱

副主编:刘德荣

编 委:王致谱 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刘德荣 福建中医学院教授

余永燕 中国中医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

张爱军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连智华 中国中医研究院骨伤科研究所硕士

赵洛匀 山东省临沂地区中医医院主任医师

严康维 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善本室副研究馆员

裘 俭 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流通室副研究馆员

程东旗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

吴文清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硕士

农汉才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硕士

编 选 说 明

一、在近代中医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民国当属一个颇具特色的时期。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实行歧视、压制、打击，甚至欲取缔中医的反动政策，中医学术发展举步维艰；另一方面是西方医学强烈地影响、渗透、冲击着传统医学，许多人对中医的科学性产生了动摇乃至怀疑。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医界人士依然坚持与疾病作积极的斗争，并致力于中西学术的融合与汇通，使传统学术得以继承和发扬，学术研究仍达到 20 世纪较高的水平，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医家和颇具特色的医著。一些医家历经晚清和民国两个不同时代，阅历丰富，学术纯育，他们在清代考据学风气的影响下，重视对古典医著的考证、校勘和诠释，辑复整理出的一大批古医籍文献，考据精当，论理准确，体现了当时中医学术的潮流，对传播和发展中医学学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医家们的宝贵经验，成为中医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对中医临床、教学、科研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有的甚至还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几代中医学人。

然而，由于民国距今年代较近，许多医书自付梓问世以来，一直未得重印；更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医著无法在较大范围内流传。新中国成立后，除少数名医著作曾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整理出版外，大部分仍被尘封在历史的“高阁”中，不仅给学习、研究带来不便，甚至还有佚传的可能。

为了继承中医学的宝贵遗产，弘扬中医学术，我们精选了民国时期著名中医的代表作加以整理点校，汇集成《民国名医著作精华》丛书。

二、本丛书遴选自 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38 年间 13 位著名医家的 21 部代表作。这些医书是从数以百计的中医著作中经反复论证、严格筛选出来的，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当时流传较广，社会影响较大。将之汇编成集，能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民国时期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概貌。

21 部医书中，属中医学文献整理研究的有《增订通俗伤寒论》、《重订广温热论》、《伤寒论汇注精华》、《伤寒质难》、《群经见智录》；属中医诊法研究的有《脉学正义》、《辨舌指南》；属临床各科诊疗经验总结的有《中风斟论》、《感症宝筏》、《经方实验录》、《中国针灸治疗学》；属医案选编的有《孟河丁甘仁医案》、《全国名医验案类编》；属药物学专著的有《本草正义》、《祁州药志》、《中国新本草图志》、《本草药品实地之观察》、《增订伪药条辨》；属中西汇通类医书的有《医学衷中参西录处方学》、《中西温热串解》；属医史学专著的有《中国医学源流论》等。

三、本丛书的整理和点校乃严格按照通行的古籍整理原则进行，亦即尊重历史，忠实原著，不随意更改。

鉴于民国期间全国各地的印书局（行）较多，故对入选的每部医书，尽量选用最早或最佳版本作为蓝本，并与其他不同版本同类医书对校，同时又与相关的医书文献进行旁校，力求校勘准确无误，以保证质量。

四、每部医著的篇首，均附一篇点校者的研究论述，主要介绍作者的学术思想、生平事迹，以及每部医著的写作背景、学术价值、学术特点等。使读者从中了解该名医的专长及其代表作在

近代医学发展中的作用。

五、民国期间，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部分医家开始接受新的科学知识。在其编撰的医书中，已不同程度地包含着汇通中西医学的内容。旨在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但这些内容多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为保持原著的完整性，本次校勘不做改动，相信读者在研读中能够正确领会前人的学术成果。

六、入选本丛书的著作，原多为繁体字竖排本，现统一改为简化字横排本。一些书原版中的外国人名、地名、西药名称等的译法，与现在通行的有所区别，为保持原貌，不作更动。标题层次多与原版本近似，原版的个别印刷错误，本次点校时径予更改，但均出注说明。

由于时间仓促，本丛书整理点校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点校说明

一、本书采用《伤寒质难》的初始版本，即 1950 年上海大众书店出版发行的版本。该书由祝味菊口述，门人陈苏生记录并整理。出版前，部分篇章曾于 1947 年在《济世日报——医药卫生专刊》上连载。

二、本书以点校为主，凡书中明显刊刻错误，或径改，或于文后加注；对个别生僻的字词亦酌加注释。

三、原书系繁体字本，今一律改为规范的简化字；通假字与异体字，或径改，或予保留，并在点校栏中加以说明。

四、原书系竖排本，现易为横排本。本书在原断句的基础上改用新式标点符号，为保持原书的语言风格和语言节奏，对一些分割句中主、谓、宾的断句予以保留。

五、由于历史的原因，书中所引的近代西药译名、西医学术语等与现代的略有出入，但为了尽量保持该书原貌，本次点校未做更改。

六、本书以问答形式阐发了祝氏对仲景学说的见解。其中，陈苏生的质疑问难用五号仿宋体，祝味菊的回答及其他阐述部分用五号宋体，以方便读者辨识及阅读。

祝味菊生平业绩及学术思想

祝味菊（1884—1951），浙江山阴（今绍兴）祝家桥人，晚年以“菊残犹有傲霜枝”之意，自号“傲霜轩主”。先祖世代业医，童年随父入蜀，遍览中医典籍后，又入军医学校学习西医，攻读两年后赴日本考察医学，翌年回国。曾任成都市政公所卫生科长、四川省立医院医务主任等职。1917年为避战乱至沪悬壶，曾任神州国医总会执行委员，并与该总会及医界老友等筹办景和医科大学。他先后执教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上海国医学院、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并任新中国医学院董事会董事、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院长、新中国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兼内科主任。1937年，与留美西医梅卓生、德国医生兰纳博士在上海沙逊大厦合组中西医会诊所，开中西医结合之先河。解放后，曾任上海中医学会筹备委员会委员。

祝氏治学，极其推崇仲景、景岳诸家，曾提出以八纲论杂病，以五段论伤寒。其临证重视匡扶人体正气，临床好用附子，人称“祝附子”。祝氏到上海后，因屡用温热大剂救起垂危病人而名噪一时。因其学术风格与当世的“轻清之风”迥异，也遭到

许多非议，但其影响在江南日渐深远，一些时方派、温病学派名医在其影响下也转而成为善用温热法的医家，一时在上海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祝氏学派”。因受近代文化思潮的影响，祝氏主张中医改革，提倡融会西方科学知识以发展中医。其主要著作有《伤寒新义》《病理发挥》《诊断提纲》《伤寒方解》《伤寒质难》等。其中代表作为《伤寒质难》。祝氏学派的传人有陈苏生、王兆基、徐伯远、徐仲才、胡觉人等。

融会新知 改革中医

祝氏幼年寄养于姑丈严雁峰家。严雁峰是我国清末民初著名的藏书家，其藏书楼“贵园”内有五万余卷藏书，经、史、子、集皆备，其中，“中国医籍泰半在此”。祝氏年少时因对医学有浓厚的兴趣而遍览了所藏医书，但仍不能释其对医学的疑惑。适时，西医开始传入我国。祝氏带着探索的激情，考入四川军医学校学习西医。入学两年后，该校改组，祝味菊便随该校日籍教师石田东渡日本考察医学，学习西医的处诊方式及办医院的方法等，翌年回国。

祝氏虽学贯中西，但始终立足于中医。他既反对那些崇古尊经的保守派，认为他们不能从科学上来认识西医的进步性，片面强调“国粹”，盲目排外，对西医采取敌视态度；同时，也反对那些认为只有西医才符合科学、中医则是医学发展绊脚石的崇洋媚外的过激派。祝氏认为：“没有真理，决不能造成事实。事实的造成，里面一定含有真理。”他强调要“尊重中医疗病的成绩，尊重中医有效的事实，不能因为现代科学尚无力解答其所以然而放弃不顾，更不可只赞誉而不屑应用”。他还深刻地指出医界轻视中医的症结之所在：“历来医政当局，不是西医便是门外汉，对于中医的理论，无暇细考其意义或无法判定其是非，所以对于

中医的处置常常举棋不定、无所适从”，以致中医长期处于“打不倒、站不起”的状态中。

为改变中医的这种境况，祝氏主张融会新知以改革中医。在他早年发表的《国医之危机》《改进中医程序之商榷》《中西医学概论》《营卫官能之一般病理》《病理学讲义》《正气与治疗关系》等文中，以及与西医兰纳、梅卓生合组中西医诊所，在上海新中国医学院附属医院内并设中西医之时，祝氏就已开始了从理论和实践中探索中医改革之路。他认为要改革中医，第一、第二步就是吸取西医生理、解剖及病理等学科之所长，以补中医之不足。在药理学方面，祝氏认为既应参考古法，又当采取西医的研究方法，使之更臻完备。以上三步完成后，再逐步推及方剂学、诊断及治疗学，是为改进中医的第四步。

由于祝氏有博大精深的中西医造诣、雄辩的口才、较高的威望，因此他变革中医的主张影响很大，成为当时中西医改革派的中坚人物。祝氏“从事中医革命40年”，其融会新知、改革中医的思想精华都集中体现在他的代表作《伤寒质难》中。该书出版时，在医学界引起很大的震动。随后，陆渊雷进京参加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时，曾携此书向在会的中西医同道征求《质难》之质难，在医学界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被认为是解放后中医界主张中西医结合的早期佳作。该书以科学论中医，并融会西医知识来阐释《伤寒论》，还于书后附《创设中医实验医院的建议书》，希望新中国能继往开来地改革中医，以期中医在新时代获得新的发展。祝氏为中医改革努力奋斗了一生，虽然收效甚微，但他为此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五段八纲 治人为本

祝味菊认为，医者疗病，不外乎针对病原治疗和扶持人体正气以抗病两大方法，即“治病”与“治人”。他认为：“病原繁多，本体惟一。”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人体的正气占主导地位，“一切病邪，及其侵入人体，即为人体抗力所支配，病原仅为刺激之诱因，病变之顺逆，预后之吉凶，体力实左右之”，且一切证候的表现，也都肇基于体力。因此，通过匡扶体力，同样可收正胜邪却、化逆为顺之功。同时，他以“一一求其特效之药”为“愚公之志”，认为医者“不能因病原不明，而束手不治也；亦不能以特效药之阙如，而屏不处方也”。因此，他极其推崇“本体疗法”，在其医学生涯中，亦一直以“匡扶其自然疗能，控制其疾病”为主导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以治人为本的医学体系。他的这种医学思想在其代表作《伤寒质难》中有详尽的阐述。

祝氏认为中国的仲景之学正是以“正气为本”的学术中坚，他说：“吾国医学于治疗上所以能奏伟大之功效者，亦即古圣教人尊崇正气之故耳。仲师《伤寒》《金匱》两书，为自来医家之宝函，其立法处方，无不以正气为重”，只是其语意含浑，不易探知。因此，他以《伤寒》《金匱》为本，创立了以“五段八纲”学说为中心的本体疗法体系。

祝味菊认为，在一切外感疾病中，正气抗邪的趋势不外五个阶段，六经证候亦不出“五段”范围。六经代表了五种抵抗程序，即太阳为开始抵抗，少阳为抵抗不济，阳明为抵抗太过，太阴、少阴为抵抗不足，厥阴为最后的抵抗。因此治疗的原则就在于维持人体合度的抵抗。例如对于发热，他认为：“生理所需要者，名曰平温（37℃）；正气抗邪，病理所需要者，名曰抗温

(伤寒 38~39℃); 抗邪太烈, 生理所难堪, 病理所不需要者, 名曰亢温 (伤寒 40℃ 以上)。抗温为善温, 亢温为害温。”说明某些发热是出于病理上的需要, 对于疾病的好转是有益的。故在治疗时, 他主张: “伤寒之用清, 中和亢热, 而维持抗温”, “热而不令其亢, 汗而务使有节, 保持抗力之产生, 调整废料之排泄, 此所谓合符病理”。

祝氏还认为, 以“五段”来分析正气抗邪的状况, 不但适用于外感病的诊疗, 同样也适用于杂病的诊疗, 杂病也以匡扶正气为主要的治疗手段。他说: “杂病种类繁多, 古人以为不出八纲范畴, 明八纲, 则万病无遁形矣。所谓八纲者, 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也。古昔医工, 观察各种疾病之征候, 就其性能之不同, 归纳于八种纲要, 执简御繁, 以应无穷之变。夫征候者, 疾病发展时所显之各种症状也; 八纲者, 古人管理疾病之一种定律也。”此“五段八纲”学说, 集中体现了祝氏以治人为本的医学思想, 他亦自称其一生的精华就在于此。

因此, 在治疗中, 他的着手处常不单纯在于消除症状, 还在于诱导机体进入良性抗病程序, 以期正胜邪却。在此基础上, 祝氏对中药的“四气五味”也有新的理解。他认为辛甘酸苦咸五味选择性地作用于特定脏腑, 而寒热温凉四气则对整个人体发生作用, 寒热温凉四气不过是“扶抑正气之符号”, 其实质在于调整抗力。如寒性药可以调整抗力太过, 温性药可以补充抗力不足, 凉药可以调整抗力旺盛而偏亢, 热药可以调整抗力衰微, 虚怯过甚。因抗力受体气盛衰所左右, 所以寒凉药或温热药主要视体气的不同而施用, 用寒凉药必定是体气盛而抗力亢盛者, 用温热药必定是体气弱而抗力不足者。如治表证, “气亢者折之以寒, 气盛者和之以凉, 气怯者壮之以温, 气衰者扶之以热。此治表之准绳”。祝氏对中药药理的新阐发, 为“证”的“寒热”和“药”

的“寒热”搭起了新的桥梁，突破了以往寒热证的用药规则，这也解释了其在临床中对于热病也大量使用温热药而出奇制胜的原因。

祝氏虽推崇本体疗法，但其对针对病原的疗法，如抗菌、抗毒素药并不排斥和否定。他认为“有病原特效药，更能兼顾体质，则特效药之效力更确；无特效药，而能时时匡扶体力，亦可令正胜邪却，收化逆为顺之功。”因此，他希望医生们都能掌握中医这种最可宝贵的方法，以“应用无穷，历万古不变”。

点将附子 奇兵制胜

在祝氏以人为本的医学体系中，祝氏认为，人体的正气、抗病能力往往体现在人体的“阳”中，“阳衰一分，则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则邪却一分”。因此，其在临证中非常重视温热扶阳的治疗法则，曾博引历代医家有关扶助阳气的论述，并概括为“气足则抗能旺盛，阳和则抗生滋长”。他认为：“温药含有强壮之意，非温不足以振衰惫，非温不足以彰气化”，“形虚气怯，神萎力疲，独任附子振奋细胞、活跃抗力，以奏捍卫之功”。因此，他在临床中好用附子，甚至对于外感热病也常以大量附子为主药，且常出奇制胜，故人称“祝附子”。

祝味菊尝曰，附子为将军药，性极猛烈，用得其当，效如桴鼓，用失其当，其害立见，故必须仔细辨证而后用之。他认为在临床用药时，选择附子的品种非常重要，温补元阳，首推黄附片，乌附及明附次之。黄附乃四川所产，由盐卤所制，毒性小，效力大。黄附片也是祝氏在临床中应用最多的一种附片。祝氏对于附子的煎服法也很讲究，凡是附子，不论何种类型，都先以热水煎煮半小时，再纳他药同煎，以不麻口为度。上海医家何时希

在回忆祝味菊时说：“他不是图侥幸而用附子，用附子不是哗众取宠，他是有根据的，所以敢于重用，又胆敢看着煎药（当然首先是辨认是否黄厚附块，当时上海习用的是淡附片、熟附块，有注明‘用盐水浸透’者），监着灌药，等待病人汗出熟睡，或汗止厥回而后去。这种负责的精神，求之古人亦少见记载。”

为发挥附子“劫病救变”的将帅作用，并避其毒副作用，使之能应用于不同体质、不同病证，祝氏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创立了许多附子的配伍方法，并将其总结归纳为“相佐、相制、相用、相得”，如“加沙参、麦冬为清肺，人参、甘草为益气，白术、干姜为扶脾，是相佐也；加地黄、龟板为滋阴，是阴阳相配合，相颉颃也；加石膏、知母为清上，黄连、犀角为凉营，龙胆、黄柏为清下，是相制也；以甘佐以温辛，如甘草、大枣、生姜、桂枝、麻黄等，是相用相得也”。祝氏认为，如此配伍，“则上热下寒、外热内寒、标热本寒、阴阳俱虚，皆无往而非附子之对症。若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单味而不知复方，则自然视附子如毒蛇猛兽矣。还有龙骨、磁石、牡蛎、石英等石类、介类之药，质重可抑浮阳，制暴为良，引附子归于下焦”。

祝氏在临床中如此广泛而巧妙地应用附子，在近代上海中医界实属罕见。有学者曾就祝氏的70例病案作过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这70例病案中，共计有疾病38种，其中34种疾病共62案运用了附子，占88.6%；生附片的最高用量达每剂24克，黄附片的最高用量为每剂30克；小儿用量为每剂6~15克，成人多为每剂15~24克。何时希评价祝氏曰：“在《伤寒》《金匱》中，仲景所用附子者18方，与附子相配之药有45种，‘八阵、八法、七方’之类均有。而祝氏如此善用附子，可知祝氏是得仲景真髓，而祝氏又自多启悟，自成一家。”

祝氏崇尚温热之法，对于温病学派过用寒凉的风气的批判自

然也是毫不留情的。他认为温病学派的时医只重于料病识变，而不在于劫病救变，轻清淡药只是“敷衍塞责”、“牺牲病家以求名利”。在临证中，祝氏更如“黑马”一般，出人不意，常在危难时刻为病家“担保具结治病”，以其卓越的胆识救人于一线间，被医界称为“医侠”。例如，当年上海温病派儿科名医徐小圃的长子徐伯远年轻时患伤寒重症，诸医束手，认为不治。祝味菊却一并承揽，在其高热神昏、病情危笃的情况下，投以附子为主的温热峻剂，竟一夜间大获转机而痊愈。徐小圃为此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几代家传的医术，他不但虚心撤下“儿科专家”的招牌重新向祝氏学习，还让二子拜师于祝氏门下。几年后，徐小圃就完全转变成了善用麻、附等温热剂的儿科专家。在1962年出版的《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中，徐小圃则被收录于“重阳”、擅“温热药”的流派之中。

另外，祝氏对于沪上名医陈苏生的医学见地及用药风格的影响与转化，更为医界所传颂，被比之于明代王心斋之投王阳明。陈苏生（1909—1999），早年曾拜钟符卿、沈仲芳等为师，悬壶不久即声名大振。但34岁时，其姨丈家中先后三人罹患伤寒，苏生虽多方努力，并遍请中西医名家，结果都以失败告终。他深感负疚，决计再访名师，重研医理。1943年，陈苏生结识了祝味菊，经过几度辩论和长谈，陈苏生大为折服，终于第三次拜师，投于祝氏门下。陈苏生的这次拜师，在中医界被传为佳话，符铁年曾作楹联贺陈苏生曰：“早为海上悬壶客，今是山阴入室人。”陈苏生拜师后，益加勤奋，常到祝家探讨学问，反复辩难，常常夜半才归，回家后便笔录当日之问答，将其命名为《师门问答录》。如此持续了五六年之久，《伤寒质难》一书便是在此基础上整理而成的。临证中，陈苏生一改往日医风，在掌握了祝氏医学精髓后，又根据江南人的体质特点，融会了沈、钟二师的“轻